

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张连红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之一，但更为不幸的是战后六十年来，南京大屠杀却仍然是日本右翼不断歪曲否认其侵略历史的突破口，甚至成为某些日本政界要人进行行政争的工具。与此相反，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学术理性氛围日益浓厚。一方面有许多学者潜心搜集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经过海内外数十位学者4年多的合作努力，200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张宪文教授领衔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该史料集按专题汇编成28册，合1500万字，几乎囊括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文字版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其中约有一半史料是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宽广、深入和系统，而且更趋客观理性。据笔者了解，仅2005年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著作就有：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高兴祖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罪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笠原十九司著、李广廉等译《难民区百日——亲历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连红、经盛鸿、陈虹等著《创伤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广义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林长生著《南京大屠杀之铁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每部著作均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笔者仅就孙宅巍所著谈

些感想。

孙宅巍是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1997年由其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是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最近几年来,孙宅巍尽管深受病魔困扰,但其仍一直活跃在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线,其新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下文简称《澄清历史》)是一部史论性质的著作,全书围绕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与时空范畴、南京安全区的历史地位、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性暴力、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南京大屠杀中民众的抗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响和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等10个专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实事求是、客观中肯的学术观点,体现了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昭示了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趋向。笔者拜读之后,深受启发,特向读者推介。

一 实事求是:学术研究的真谛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能否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进行探讨是衡量一部专著学术价值的关键。在该书第六篇中,作者首先从沦陷时南京人口的构成、各慈善团体社会机构等埋尸资料、陷城官兵人数等进行了历史考证,作者认为“30万以上”被屠杀的认定,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支持。^①与此同时,作者通过深入考证,指出许多学者对盛传一时的广田电报的内容的误读,他认为不能以此作为30万人遇难的直接依据。

^① 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另外,该书还专门辟出一目来探讨埋尸活动中的交叉现象。对于埋尸活动中的重复问题,作者并没有避讳,而是客观加以论证。作者指出必须重视各埋尸机构与群众团体之间交叉与重复统计的现象,如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资雇工掩埋的 3 万具尸体明显与红十字会收埋的 4 万余具尸体相重复;伪政府卫生机构利用代葬局工人收埋的 1 万余具尸体,也明显与代葬局声称收埋的 1 万余具尸体相重复。其他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交叉现象还包括: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与上海分会的埋尸活动,同以刘德才为埋尸组组长的同善堂与红十字会的埋尸活动,以及伪区政府通过红十字会、崇善堂收埋尸体等。作者认为埋尸活动的交叉,虽然并不等于重复统计,但需要研究者冷静、慎重地对待。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人数问题,作者的论述相当理性,作者以自己的学术良心坦言,对于遇难者人数的研究,我们在认识上必须走出“求精、求高、求恒”的误区。作者认为“不应带着一个固定的框框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如果在研究中,有一个有形的或无形的框框存在,就容易有意无意地出现对史料采用、解释上的偏向性”。“要有勇气承认学术探求是没有止境的。新的资料还会不断发现,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还会不断深化,史学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不断对已有结论加以反思和修正,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 30 万再多一些,还是 30 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这种理性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贯穿全书始终。

作为受害国的学者,作者没有以感情代替理性,而是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科学探讨,其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二 开拓创新: 学术研究的生命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作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孙宅巍先生一直跟踪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上不断推陈出新。纵观全书,其讨论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学术界最新关注的问题上。如该书第七篇中讨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民众的抗争,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分强调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忽视了南京民众进行英勇抗争的一面。作者认为: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不仅充满了中国人民的悲惨灾难,而且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南京军民在城陷时进行了勇敢的巷战,在屠杀中实行了不屈的反抗,在惨案后坚持了不懈的斗争。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是同一事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提及南京人民在大屠杀期间的抗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担心给日本右翼提供曲解大屠杀原因的借口。“抗争可以被解释为促使日本侵略者进行屠杀或扩大屠杀规模的因素之一。但是,‘原因’并不等于‘理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者对此尖锐指出:“那种自觉不自觉地抑制对抗争揭示的做法,既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抑制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①又如有关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问题,学术界最近讨论也相当热烈,作者在第十篇中专门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很有深度的研究,作者认为: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来官方与个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由于中国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本少数右翼的翻案等多方面的原因促

① 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 318 页。

使这一记忆在不断加深与加强。而且表现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新旧政权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基本认识的一致性。第二,中国官方与个人、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一致性。^① 所论所述,均令人耳目一新。

最令人敬佩的是,作者第一次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身上,并辟出专章十分深入地探讨了幸存者的定义与定位。作者认为:“所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所留下的记忆,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社会群体,他们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他们的晚年生活,都应当受到全社会的特别关注。”作者在书中还指出,一方面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的概念含混不清,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有关部门公布的幸存者人数同实际人数之间差距较大,作者希望这应当引起学术界与有关部门的重视。将研究视角从历史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幸存者,这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简单转换,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

正如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他“写作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要把一些理论问题论深论透,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应当说,作者的这一愿望不仅圆满实现,而且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三 史料扎实:学术研究的基础

最近几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等珍贵史料相继出版。孙宅巍先生在撰写《澄清历史》一书的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

^① 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374-375页。

史料集》(28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承担了第5册《遇难者的尸体掩埋》的编辑。因此,该书充分运用了所有最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史料扎实新鲜是该书的又一特点。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从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挖掘了一批有重大价值的珍贵资料。许多新发现的资料,在该书中均为首次披露。例如,以往人们谈到慈善团体和伪区政府埋尸时,都只讲到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同善堂4家,共埋尸18.5万具;伪第一区政府和伪下关区政府,共埋尸3.5万具。而本书中,作者还运用了其最新发现的埋尸档案记录:如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埋尸1500余具,代葬局埋尸1万余具,顺安善堂以600元雇工埋尸应约为1500余具,明德慈善堂埋尸700余具,计为13000余具;伪第二区政府、第三区政府通过南京市警察厅、红卍字会、崇善堂等单位,分别埋尸27具与13具。除了运用大量档案原始资料外,作者还充分吸收了最近几年来许多社会调查的口述资料,如戴袁支和费仲兴等人在汤山地区日军暴行的调查报告,以及松冈环在日本对老兵的访谈资料等。

此外,该书附录中载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案例1—470件。这份附录的价值相当高。因为在此之前许多有关资料中,日军暴行的案例都不完整,此次作者利用编辑2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机会,查阅了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和英文版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的资料,经精心查核、编译,做到一条不缺。此举填补了以往书籍中此类案例的空缺部分,读来亦使人耳目一新。

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各篇所展开论述的内容中,存在某些重复与交叉。如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分别在“保卫战篇”与“原因篇”中均有论述,尽管前者是作为保卫战失败

的原因,而后者则是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导因之一。当然,根据此书的体系,欲各篇之间完全不重复实难做到。在体例上,各篇二级目的设置不够统一,第五篇“性暴力篇”中的 3 个二级目与第八篇“幸存者篇”中的 3 个二级目,其份量只相当于其它各篇中的三级目,因而显得较为单薄。另外,作者围绕其设置的十个主题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但有些结论尚值得认真推敲和商榷。如该书在第二篇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将“日本侵略军的预谋”作为原因之一的论据尚嫌单薄。又如作者对南京大屠杀时空范畴的讨论,作者主张南京大屠杀地域范围除了南京市所辖的 12 个区,还应当包括市区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三县,这一观点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日本的笠原十九司也持这一观点,但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实际上并不包括江宁、江浦和六合三县,目前我们所搜集的南京大屠杀史料绝大多数都是反映南京市所辖 12 区内的日军暴行。

当然就全书而言,孙宅巍的新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毫无疑问是一部求真、求新、求深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国当前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标志着国内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趋向日益深入客观理性,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